

扶危濟難，義勇鷹揚：

《「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讀後

徐 成*

孫衛國

《「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4月，頁344。
ISBN 9787520177030

萬曆抗倭援朝戰爭（1592-1598）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課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主流聲音是日韓學者所發出，中國學者關注度不夠。中文學界某種程度的失語，不可避免地將重要參戰方明軍的歷史貢獻之解釋權拱手讓人；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學術成果日益增多，情況逐漸好轉。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新著《「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可謂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值得重視。下面就此書相關問題，略陳己見，以就教於方家。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Email: xuchengkdx@mail.nankai.edu.cn。

一、東亞視野——三國史料與多元視域

中日韓三國學者對壬辰戰爭研究，呈現出各自迥異的面貌：日本學者重視日韓史料，偏重於技術性問題的研究，考辨紮實，梳理細緻。但缺乏全局意識，對明軍較為忽視，對戰爭所造成的災難與影響基本不提，看似客觀，卻呈現了將歷史事實扁平化、簡單化、線性化的學術傾向；韓國學者不能擺脫民族主義史學的窠臼，多只關注朝鮮本身，忽視甚至歪曲明軍戰績，明軍被扭曲為自私自利、軍紀敗壞、逃兵眾多的惡性形象；中國學術界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就有學人開始研究，至今近百年，也積累了不少成果，但相對缺乏東亞史視野，國際學術對話意識較弱，有自說自話傾向（頁1）。¹為了克服這些傾向，本書採取跨國史的東亞框架，全面梳理中日韓三國史料，客觀剖析，誠為一大亮點。

在中國史料的部分，本書既能使用《明實錄》及《明史》等官修史籍，又能參酌如諸葛元聲（生卒不詳）《兩朝平攘錄》、茅瑞徵（1577-?）《萬曆三大征考》等私家史書；既深入解讀宋應昌（1536-1606）《經略復國要編》、邢玠（1540-1612）《經略禦倭奏議》等當事人所編著的一手記錄，又關注沈一貫（1531-1617）《敬事草》、申時行（1535-1614）《賜閑堂集》、趙志皋（1524-1601）《趙文懿公文集》等文集資料，徵引全面，靡有遺漏。而對朝鮮史料的對勘、批判使用誠為本書最為成功之處：以《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等官方史書為經，以柳成龍（1542-1607）、申欽（1566-1628）、李舜臣（1545-1598）、李德馨（1561-1613）、李廷龜（1564-1635）、鄭昆壽（1538-1602）等王亂親歷者的記錄為緯，參稽《宣廟中興志》、《再造藩邦志》、《擇里志》等後世朝鮮史家著述，構建起一個豐富堅實的朝鮮史料根基。不僅有助於「還原現場」，且盡可能吸納朝鮮古代史家的意見，不虛美、不隱惡，含弘吐納。同時參稽日本《島津史料集》、《日本外史》、《征韓偉略》等資料集。著者以三國史料為據，擺脫國別史的局限，以東亞史視野，以明軍將

¹ 另參陳尚勝、趙彥民、孫成旭、石少穎，〈地區性歷史與國別性認識——日本、韓國、中國有關壬辰戰爭史研究述評〉，《海交史研究》，4（2019），頁120-124。

士為綱，對於戰爭相關問題，進行了多重層面的解讀，糾正了許多錯謬，深化了對戰爭的認識。

著者對石星（1537-1599）的考察，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石星作為主持萬曆間「三大征」的兵部尚書，是明軍東征朝鮮乃至封貢之議的重要決策者，《明史》卻無傳，後世亦鮮重視。與明清絕然不同的是，在朝鮮半島，石星卻備受關注與感懷。作者針對這種差異，以明朝與朝鮮兩方史料入手，自石星初入仕途的偏執「愚戇」性格說起，首先剖析了石星力主援朝的動機，對勘明朝史料、《通文館志》及親歷請援的鄭昆壽《柏谷先生集》等史籍，駁斥了韓國人津津樂道的石星報恩援朝說的荒謬，論證了石星力主出兵乃是因公奉職，非徇私情。之後再梳理石星堅持封貢日本的始末，利用中朝官私史乘及日方文書，證明石星之封貢乃出於沈惟敬之欺，也是石星偏執剛愎的政治心性所致，後面更有趙志皋等內閣樞輔重臣的推波助瀾。最後從朝鮮官方關照「石尚書後裔」入手，跳出石星後裔本身的真偽疑問，點破其背後蘊含的朝鮮王朝「尊周思明」義理的所在。一以貫之地論證了朝鮮王朝施恩於「東征將士」後裔是出於感懷的觀點，也為著者舊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提供了新旁證。²

第二個案例是針對首次援朝經略宋應昌的探究。同石星類似，宋應昌在《明史》亦無專傳，且亦頗受後人「自張其功而匿其短」（四庫館臣語）的譏諷。著者以宋應昌自著的、匯集大量一手奏疏書信的《經略復國要編》為基礎，浸入斯書而又能脫於斯書，不拘泥於宋氏包含過多個人情感的一家之言，綜合參稽朝鮮《宣祖實錄》、《壬辰史草》、《龍灣見聞錄》、《辰巳日錄》等多種史料，還原出宋應昌在朝鮮戰場的權力職責之重與參與程度之深——包括宋應昌久居遼東調劃指授、拒見朝方引發的誤解，以及宋應昌與李如松（1549-1598）之間矛盾（南北失和、敘功不均等等）對戰事的影響，所論皆鉤沉深刻，入木三分。尤其是能用堅實的證據，澄清「宋應昌乃主和之輩」這樣積漸已久的成說，將應昌極力貫徹石星策略、戰和並用的形象昭著紙端，既認知到了宋氏所著的自辯性，又客觀還原了宋氏真實的歷史功績，可

²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謂為古人洗誣矣。亦為治史者如何取舍使用親歷者個人記錄，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樣本。

總之，不僅是中朝史料的對勘，日本史料，甚至是當時在日本乃至東亞地區活動的傳教士所編文獻，都應該劃入學者注意的範圍。本書既在全局上有中日韓三國的比較視野，又在具體細化研究時，綜合使用質化和量化研究範式相結合、思辨和實證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橫斷與縱向相結合的多元視域考辨。正如清儒所云「參伍眾說，歸於一是，乃可下筆」，³這無疑是一種應該堅持的原則。

二、群體與個案——研究東征將士的範式

對東征明軍將士的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已有不少學術成果，但如何凝煉出一個研究模式，仍然是眾多學者所不斷探索的。楊海英《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中，以上編寫吳惟忠（1533-1611）傳，下編寫胡大受、王必迪、毛國科、葛峰陳氏家族及義烏兵將八十家的方式，通過對眾多個案的研究，還原出「南兵」群體參與援朝的戰績。⁴通過破解眾多個案的方式，最終拼圖成一個完整的「模塊」，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究指向。著者則通過深究石星、宋應昌、楊鎬（1555-1629）、李如松等東征將士的個案，將戰爭歷程融於人物探究之中，通過群體考論與個案細究相結合，以微觀探索證明宏觀縱論，細中有宏，宏微之間，相輔相成。

著者針對李如松的研究，靈活運用了這種方法。李如松歷來為治抗倭援朝乃至整個明代軍事史的熱點研究對象，學術成果豐碩。著者在這一看似「老」的問題之中，窺出了「新」的問題意識——即李如松紛繁複雜、聚訟紛紜的援朝戰史過程，還存在相當模糊之處，亟待澄清。比如其麾下軍隊來源、平壤大捷為何遲遲不頒功、傳說中的李如松朝鮮後裔……著者詳考中日韓三國公私史著，考證出李如松的部隊來源有三：（一）最親近的遼兵，（二）

³ [清]潘耒，《遂初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5，〈上某總裁書〉，頁290。

⁴ 楊海英，《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宣大山西、薊鎮等其他九邊之將士，（三）以戚繼光（1528-1588）之良法訓練出來的南兵。可謂是傾天下之精兵東援屬國，因此大軍甫入朝，便取得了輝煌的平壤大捷。但此場大捷，明、朝、日三方各有言辭，著者鉤沉索隱，澄清了此戰乃奇捷，獨具慧眼地從明廷主和主戰兩派政爭、南北黨爭的角度，分析了敘功不平的背後原因。從輔臣趙志皋、樞臣石星乃至經略宋應昌等文官系統，都有戰和兩手準備，這和李如松為主的武官們乘勝追賊、立功絕域的要求，本質上存在矛盾；而且在朝鮮前線，應昌偏南、如松袒北，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在《戰爭論》中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延續，⁵著者能深切地體認到包含平壤之戰在內的抗倭援朝戰爭諸多問題，都與黨爭甚至明代文武制度性的矛盾難解難分，誠為確論。

首先，著者針對東征將士群體作全局性解讀，第一章〈萬曆抗倭援朝戰爭中的明東征將士群體〉，便是從明東征將士人數的考證、明東征將士群體來源的分析、明東征軍事指揮體制的特點等三個維度，分別切入，層層推進，系統而條理地展現了東征明軍的整體性面貌，奠定全書論述的基礎。為顯直觀，運用了多幅圖表來科學嚴謹地說明。表格的基礎，是建立在諸多重要史料之上的，既有親歷者記錄如申欽（1566-1628）《象村稿》，又有朝鮮王朝重要史籍如李肯翊（1736-1806）《燃藜室記述》、吳慶元（1764-?）《小華外史》，還對勘了同一系統的《宋經略書》等稀見史料。眾多說法，信者直書，疑者亦不妄刪，姑備存疑，閱之明白清晰。清儒崔東壁（1740-1816）在治史時對史料「尤致慎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⁶學人考證，此條信夫不誣也。著者又利用兩次援朝的文官統帥宋應昌、邢玠的一手記錄，分析出兩次援朝中，將士們的三個主要來源：（一）九邊兵，（二）京營兵和南兵，（三）川兵和夷兵（甚至包括外國人）；從兵種上而言，則有騎兵（馬兵）、步兵、水兵、火炮兵，豐富且全面。也能側面看出明廷確實出動了全國各類精銳去救援朝鮮、保全屬國。

⁵ Karl von Clausewitz 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翻譯組集體翻譯，《戰爭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卷1，頁43。

⁶ [清]崔述，《唐虞考信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1，頁4。

在隨後章節中，依然關注明軍部署、兵力、兵源的具體討論，考證明軍具體數目、兵源，以批駁日韓歪曲明軍的說法，成為全書一大亮點。

著者對東征軍事指揮體制的探索，頗有新意。作者把東征期間的軍事體制，放到整個明中後期軍事體制下討論：明代文官牽制武將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模式，這一套模式在戰爭中也不斷調適。在壬辰第一次援朝時，文官最高指揮經略，武官則是總領軍兵沖鋒陷陣的提督，經略居於提督之上。但經略宋應昌長期居於遼東，遠程調度，與前線的提督李如松往往發生沖突、掣肘；因此在丁酉第二次援朝時，既有經略全局的文官總督——督臣邢玠，其下又有具體在前線的經理——撫臣楊鎬，本來在丁酉初期提督南北水陸官兵的鎮臣麻貴，在後來也按戰況析解為四路提督——麻貴（1538-1616）、董一元（約 1536-1622）、劉綎（1558-1619）、陳璘（1543-1607），分工合作，互相獨立又互相配合。著者動態地對此進行析論，其見解頗具匠心，亦相當有啟發意義。著者對這一體制所進行的全局性考察，與具體人物行跡的個案性研究，是互為佐證、相得益彰的。

如何處理東征將士群體與個案之間的關係，是學者進行研究時必須斟酌的。壬辰戰爭中南北兵及文武官之間的分合，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政治立場上的歧異，更是由於各派系的實際利益沖突，因此僅依靠中國方面留下的史料，可能出現人言言殊的現象。有鑒於此，對三國比較視野下加強個案研究的同時，提高對群體全局觀的認識，無疑有助於推動東征明軍將士群體乃至整個壬辰戰爭研究的深入。

三、書寫與建構——從史籍編纂中讀到的壬辰戰爭

本書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貢獻，便是從明清史籍建構的角度，來解讀東征將士及壬辰戰爭。著者之所以能從這一層面加以考量，與其所具有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素養密不可分。⁷歷史編纂本身是一個「意義產生的過程」，⁸史

⁷ 著者曾師從著名史學史大家楊翼驥子昂教授，學術視野廣闊，研究方向廣泛，除中韓關係史、明清史、韓國史、海外中國學研究以外，對中國史學史及史學理論亦有心得。

⁸ Hayden White 著，陳恆譯，〈舊事重提：歷史編撰是藝術還是科學？〉，收入陳啟能、倪為國主編，《書寫歷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頁 24。

家認知史實，需要基於歷史文本的生成、解讀與傳播，個人不可避免地影響歷史文本，亦被歷史文本所影響。明清史籍與朝鮮史籍對楊鎬功過、丁應泰（1556-1605 後）彈劾事件的不同敘述與不同立場，便是相當典型的研究樣本。

以楊鎬為例。在《明實錄》乃至《明史》等明清史籍中，不管是其參與領導的丁酉援朝蔚山之戰，還是薩爾滸之戰（1619），楊鎬一直是一個敗軍喪師、毫無功績的形象。這種認知在相當一段長的時間內被史家默認，可謂習焉不察。但矛盾的是，在《朝鮮宣祖實錄》等一系列朝鮮史籍中，楊鎬卻又是另一種功臣的形象。究竟孰是孰非，本書以「異域之眼」對勘考察，說明蔚山之戰實是大捷，而非明清史籍所言大敗。楊鎬被認為蔚山戰敗撤職，實際有三個深層原因：第一是內閣趙志皋與張位（1538-1605）的黨爭結果，趙志皋令丁應泰彈劾張位所支持的楊鎬，並借楊鎬之罷，使張位失勢；第二是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矛盾，趙志皋本身是主和派，其因封貢失敗，閑住居家。再次得勢後，必然貫徹自己主張；第三是久已存在的南北兵矛盾，楊鎬袒北抑南，軍心難穩，南兵將領陳寅（?-約 1622）等為楊鎬下臺亦落井下石，推波助瀾。而後來楊鎬在薩爾滸之戰的大敗，也使得明廷蓋棺論定，徹底否定了楊鎬。《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史官，不可避免地一否再否，對援朝與薩爾滸之戰兩次戰役，完全選擇了攻訐楊鎬一方丁應泰的奏疏，而根本漠視東征將士、朝鮮君臣在內的為楊鎬辯護的材料，從而奠定了《明實錄》否定楊鎬功績的基調，也成為以後明清史籍的主要史源。薩爾滸之敗影響了明清史家對楊鎬的書寫，但不會影響朝鮮史家，因為楊鎬援朝的功績，朝鮮是親身體會最深的。所以利用朝鮮史籍與明清史籍綜合對比分析，力求探究史實真相，成為本書一以貫之的原則。

丁應泰彈劾事件是另一場攪動中朝關係的政治混亂。丁應泰在主和派首輔趙志皋的慫恿下，以一兵部主事之職，兩次赴朝，兩次彈劾，彈劾對象包含東征將官及朝鮮君臣，波及範圍之廣，引發影響之大，實屬罕見：丁應泰劾邢玠、楊鎬等人隱瞞實情、喪師欺君，又劾朝鮮方面不尊中國、勾結日本，混淆視聽，顛倒黑白。楊鎬因此罷職，而朝鮮方面反復三次辯誣，才大致消釋影響。但可惜《明神宗實錄》纂修時，楊鎬領導的薩爾滸之戰方敗不

久，輿論洶洶，士民激憤。誠如上文提到，丁應泰的攻訐之詞反而被《明神宗實錄》採納，以至於流傳後世，難以挽回。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錢曾（1629-1701）仍如此評述：

東征之役，老師費財，凡七年始竣事，僅收功於關白之死。摧醜虜而委於天，可見非人力也。當日樞中閫外，張皇奏績，貪天以為己功，獻俘疏圖，不幾為屬國之所笑乎？世之紀錄者，傳聞異詞，一時功罪失實，俗語流為丹青。公（錢謙益）嘗以丁應泰《東事始末》手稿示余，故余知東征之事為信而有徵。⁹

可見丁應泰的說法傳襲久遠，清官修《明史》依然見其影響。與此同時，東援朝鮮的明軍將士們，「後來在遼東成為後金的對手，為了塑造清朝的正統性，必須對他們采取否定態度」，這也是導致清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否定性書寫的兩個主要原因。¹⁰而清修《明史》作為明史研究的重要正史性著作，其具有到的話語分量是不可忽視的，後世史家便在這種層疊積累的誤說之上，一直否定楊鎬戰績乃至萬曆援朝整個戰爭。

這些積非成是的誤解提醒我們，應該更加仔細地審視史料的建構、史學文本形成時的社會與政治背景。正如艾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反思後現代主義史學時所說的話：「後現代主義鼓勵歷史學家更貼近地閱讀文獻，更嚴肅地對待文獻之表面呈現，在新的方面來思考文本和敘述；它還有助於我們開闢新的研究課題與研究領域，同時將以前看來許多已難做出新意的舊課題重新提上研究日程；它也迫使歷史學家前所未有地質疑他們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質疑中，讓他們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¹¹我們也應該從文獻的表面呈現中，嘗試「回到歷史現場」，將其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下，思索其

⁹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還朝詩集上·九月初二日奉神宗顯皇帝遺詔於京口成服哭臨恭賦挽詞四首其三〉，頁2-3。丁應泰將彈劾奏疏等自己立場的材料輯為《東事始末》，此書手稿曾被應泰之子示於錢謙益，錢曾箋注錢謙益《送劉編修頒詔朝鮮十首》時，曾大量引用此書內容，略可窺丁應泰一派眼中之東征史事。錢曾所引內容可參《牧齋初學集》，卷2，〈還朝詩集下·送劉編修頒詔朝鮮十首其六〉，頁53-60。

¹⁰ 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5（2018），頁21-37。

¹¹ Richard J. Evans 著，張仲民、潘瑋琳、章可譯，《捍衛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248。

說法形成背後的深層原因。本書闡釋明清史料對於本次戰爭的建構，展示了一個相當成功的實例，看似考證的背後，實際上蘊涵了理論的訴求。

四、幾個問題的獻疑

縱觀本書，考論翔實，筆力縱橫，基本結論令人歛服。宏觀上看，著者選取了石星、宋應昌、楊鎬等高階文官，李如松、陳璘等高級武臣，樣本集中在高級指揮身上。但一場戰爭的執行，除了高層指揮的運籌帷幄、高屋建瓴，中層下層將校兵士令行禁止、嚴格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視。本書對中觀層面的中下級將領關注不足，或可注意。¹²而且即便是高階統帥，亦尚不全面，缺少邢玠（1540-1612）、萬世德（1546-1602）、孫鏞（1543-1613）等人，總顯遺憾。而從微觀上看，本書中亦有幾處瑕疵或可商榷，有幾處所論未盡之處可進一步申明，筆者謹此管陳，以補苴罅漏：

其一，有關日本史料的問題。本書儘管注意到了日方史料的對勘，但相對中朝史料的比重而言，利用程度尚顯不足。日方史料有一手文書，如《淺野家文書》、《小早川家文書》、《島津家文書》等參戰者文書檔案；還有親歷者文集、日記、覺書、軍記物語等，如玄蘇景轍和尚（1537-1611）的《仙巢稿》、天荊（生卒不詳）的《西征日記》、吉野甚五左衛門（生卒不詳）的《吉野日記》、梨羽宗景（生卒不詳）的《梨羽紹幽物語》等；參戰者家族或者後人所修譜系家史，如對馬島宗家的《宗氏實錄》、薩摩島津家的《島津國史》、貝原好古（1664-1700）所編的《菅氏世譜》、藤堂高虎家族的《高山公實錄》等。這些史料都是可以進一步參考、挖掘的。再如作者已經利用過的川口長孺（1772-1835）的《征韓偉略》、賴山陽（1781-1832）的《日本外史》等後世日本史書對歷史事實產生的歪曲，也可以進一步從史源角度、這些史書成書時的社會及文化背景，解析其歷史書寫和歷史文本形成歧異與扭曲的深部根源。

¹² 如楊海英《域外長城》一書對吳惟忠等次高一級的將官、「義烏兵將八十家」等中下層將官展開過研究；徐成《壬辰戰爭中的宣大將士相關問題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20）也對解生（?-1600）、頗貴（1543-?）、擺賽（?-1598）、楊登山（?-1604）、高策（1556-1618）、任自強（生卒不詳）等中層軍官展開過研究。

但筆者也認為，日本文獻即便是文書檔案、親歷者日記、覺書等一手材料，其利用也需要相當地審慎，比如參與了泗川之戰的淵邊真元（生卒不詳），在其回憶中便誇張博炫，滿紙空口大言，稱三路之戰中明朝與朝鮮聯軍總共有 56 萬騎之多，在第二次蔚山之役時圍困加藤清正的聯軍有 18 萬人；¹³再如泗川之戰日軍參戰者的一手文書，島津等人匯報聲稱自己面對「二十萬騎」的明朝朝鮮聯軍，¹⁴總共斬殺了 38,717 人。¹⁵但問題是中路打泗川之戰的明朝朝鮮聯軍總共也不過兩萬九千多人，島津等人純屬欺謊。這一數字後來也被川口長孺的《征韓偉略》所採，記為「三萬八千七百餘」，謬誤沿襲可見一斑。¹⁶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日軍的不少覺書和陣記雖然是當事人的一手敘述，但它在講述日方自己的戰爭部署上的價值，要大於其在描述對方人數尤其是明軍人數上的價值，需要審慎對待。

其二，第二章有關石星的幾個問題。著者對石星生卒、早年經歷以及其後裔等情況的考察，還是稍顯簡單和遺漏，若補齊相關證據，論證想必更堅實。根據趙南星為石星所撰墓志銘，石星生於嘉靖丁酉年（1537）十二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己亥年（1599）九月七日，妻鄭氏、魏氏、高氏，妾李氏、袁氏、周氏、何氏，有二子茂岐、茂恩，茂岐早卒。¹⁷因此石潭兄弟自稱星子一事，事實真偽明朗可見；又據天一閣藏《嘉靖三十八年登科錄》所記，石星僅有一兄石昱。¹⁸因此石漢英、石漢俊自稱石星弟石奎子這件事不攻自破。但正如著者所稱，朝鮮王朝對所謂石星後人的恩撫寄托了尊周思明的大義名分所在，具體的真偽細節或許已不是朝鮮王朝官方所深究的了。

其三，第四章論李如松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小問題，書中稱李如松於萬曆三年（1575）蔭為都指揮同知（頁 129），此處不確。按明朝官制，都指揮同

¹³ 淵邊真元，〈淵邊真元高麗陣覺書〉，收入東鄉吉太郎編，《泗川新寨戰捷之偉跡》（東京：薩藩史料調查會，1918），頁 83-84。

¹⁴ 毛利輝元等，〈朝鮮國引上ノ書狀〉，收入東鄉吉太郎編，《泗川新寨戰捷之偉跡》，頁 11-12。

¹⁵ 關於此一人數統計，參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4），〈豐臣氏五奉行連署狀案〉，頁 362-363。此條史料署日期為慶長四年（1599）正月九日。

¹⁶ 川口長孺，《征韓偉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卷 5，頁 760。

¹⁷ [明]趙南星，《趙忠毅公集》（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 14，〈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志銘〉，頁 409。

¹⁸ [明]不著編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頁 258。

知係流官，不可蔭授。著者此處史料來源於《明史》「李如松，字子茂，成梁長子。以父蔭為都指揮同知」之記錄，《明史》此處史源，乃《明實錄》「蔭遼東總兵左都督李成梁男李如松為都指揮同知世襲」的記載。¹⁹惜嚴南氏輯校本《起居注》，無此條記載，《實錄》乃最早記錄李如松蔭襲都指揮同知的史源。但《實錄》成於天啟，史源晚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志皋撰文、常胤緒（1560-1640）正書的《李如松墓志》，其載李如松於「乙亥（萬曆三年）以父任授指揮同知」。²⁰志中又載，此志乃李成梁（1526-1615）親自請趙志皋所寫，意即史源是李家人自己提供的行狀，可以說相當權威。因此李如松在萬曆三年蔭任的是指揮同知。《實錄》此處大抵出於史官纂修時誤增之衍文。第二個小問題，按清代鐵嶺李樹德（1670-約 1727）修康熙《李氏家譜》，如松子世忠、性忠，世忠子順祖、遵祖；如梅生純忠、憲忠，純忠生明祖。²¹又按李如松墓誌，其有二子一女，長子李世忠，次子李懋忠。對勘之下，李懋忠與李性忠大概就是同一人。由此可見，鐵嶺李氏輩分比較明確，所以李成龍自稱李如梅孫，李應仁自稱李如松孫，即便是「朝鮮妾室」所生，或許也還需進一步考證。

其四，第五章、第六章論楊鎬、丁應泰的幾個問題。本書稱楊鎬生年未詳（頁 157），筆者此前讀《萬曆八年登科錄》，知楊鎬當年為二十六歲（25 周歲），即生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讀此登科錄，還可以順帶解決另一位萬曆援朝重要人物——監軍御史陳效（1552-1599）的生卒問題。陳效當年二十九歲（28 周歲），即生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陳效與楊鎬為同榜進士，且名次僅相差兩名。²²萬曆二十七年（1599），陳效積瘁得疾，病逝於朝鮮戰場，宣祖國王親臨其喪。²³陳效作為明廷派往朝鮮的監軍御史，其實也是指揮系統中的重要人物。據本書指出，萬曆援朝中指揮體制有文官經略、經理

¹⁹ [明] 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37，萬曆三年四月癸酉條，頁 857-858。

²⁰ [明] 趙志皋，〈明故特進榮祿大夫征虜前將軍提督鎮守遼東總兵官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少保寧遠伯李忠烈公墓志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碑刻拓片，館藏信息號：墓志 4050）。

²¹ [清] 李樹德，〔康熙〕《李氏譜系》（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頁 963。

²² [明] 潘晟等編，《萬曆八年進士登科錄》（臺北：學生書局，1969），頁 10380-10381。

²³ [朝鮮] 李植等修，《朝鮮宣祖修正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卷 33，宣祖三十三年二月一日辛亥條，頁 672。

運籌帷幄作大決策，武官提督沖鋒陷陣。但筆者認為，陳效作為御史巡按戰場，其監軍督察、勘驗巡行的「按臣」角色不可忽視，這也是指揮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朝鮮方面也稱「伏見撫臣楊鎬……與督臣邢玠、按臣陳效，協謀宣力，殫竭思慮」，²⁴丁應泰彈劾時也說：「督臣邢玠、按臣陳效與提督麻貴，以及自（司）、道、將領等官，何乃未勘之先，今自商計一疏，扶同欺罔？」²⁵明後期巡按等按臣、道臣在軍事系統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關於陳效在壬辰戰爭中的角色問題，也值得重視。

本書在研究楊鎬被彈劾事件的原因時，認為其中一個緣由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矛盾，並稱提督麻貴是主和派。但據筆者研究，麻貴也是堅定的主戰派，這一點綜合參稽多種中朝史料都可以證明，而且麻貴在親自援朝之前，就因為堅定的平倭立場，被傾向於防倭備戰、懷疑封貢的孫鑣建議調來一同備戰。²⁶關於麻貴的抗倭立場乃至抗倭事跡，筆者亦另有專文探討。

另外，有關史料、既有研究以及本書皆言丁應泰為湖廣江夏縣人，且不詳其具體生卒。據天一閣藏《萬曆十一年登科錄》，丁應泰是湖廣都司武昌左衛軍戶，其祖上世襲武昌左衛指揮，當年登第時年三十一歲（30周歲），²⁷即生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其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吏部會同都察院考核評定為「罷軟」，²⁸《江夏縣志》云其彈劾楊鎬等人未成，後來罷官歸隱不久卒，²⁹則當卒於1605年以後不久。又《登科錄》此處僅言丁應泰之軍籍，未言祖籍。筆者查找《武職選簿》，惜武昌左衛選簿已佚，無法再次查明其祖籍。武昌左衛與江夏縣同城，但該衛軍戶和江夏縣民戶的區別還是應該分清。

筆者也贊成丁應泰彈劾事件的黨爭性，及楊鎬薩爾滸之敗後所有功績一筆勾銷的論點。這裏還要補充一個多面性的論述：丁應泰早年其實亦是一能

²⁴ [朝鮮] 奇自獻等修，《朝鮮宣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卷102，宣祖三十一年七月一日甲申條，頁458。

²⁵ [朝鮮] 李植等修，《朝鮮宣祖修正實錄》，卷32，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一日癸未條，頁667。

²⁶ [明] 孫鑣，《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靜遠軒重刻本），卷5，〈薊遼兵劄〉，頁20b-24a。

²⁷ [明] 不著編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頁606。

²⁸ [明] 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405，萬曆三十三年正月癸卯條，頁7568。

²⁹ [清] 陳元京修，范述之纂，〔乾隆〕《江夏縣志》（湖北：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卷10，〈行業〉，頁25b。

臣幹吏，「專精吏事」，在地方任職時，培養儒士，鼓勵文教，修葺祠宇，「講鄉約，息獄訟，四方流民歸者如市，置學田三百畝，邑人肖像祀之」，其任職之休寧、登封等處，後來皆對其立祠祭祀。³⁰所以由此可管窺歷史的複雜性，一個歷史人物是有多面性的，我們在論述時亦不宜將其臉譜化，因為每部史書的編纂者都無法脫離其固有立場，治史者當警惕之。丁應泰出於黨同伐異之心彈劾楊鎬，幹擾援朝大計，其歷史罪責無容可逭，應予譴責。但朝鮮史料一味否定其為徹底的奸邪讒人，稱其是毫無可取的鬼蜮之輩，這種極端說法也應辨證對待。因為朝鮮君臣亦曾在楊鎬、麻貴初到朝鮮時對其產生質疑甚至阻撓、詆毀，而後來卻又改變說法，這些痕跡在史料中斑斑可見。

此外，對比閱讀三國史料會發現日軍記載日期與明朝和朝鮮史籍記載有一天的差別，比如楊鎬等人領導的蔚山之戰中到達城下的日期，日方史料如《朝鮮物語》記載為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朝史料如《東征記》等書則記載為二十三日。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在十六世紀末期日本使用的是唐朝的《宣明曆》，而明朝和朝鮮使用的是明初在《授時曆》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大統曆》，有明一代《大統曆》其實因其有誤差而屢興議論。讀者如有興趣比對兩種曆法差別，可參讀《宣明曆》、《授時曆立成》、《大統曆法通軌》等書進行研究。³¹

當然，白璧微瑕，固所難免。總之，本書是一部兼採實證考據、歷史書寫等多元方法，從橫跨中日韓三國的東亞視野為視角切入，透過群體觀照與個案探研的綜合研究，來重新釐清抗倭援朝明軍史實的重要著作。可以說不僅完成了為古人洗冤、還歷史真相的基本目的，也為學界研究東征將士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啟發意義的研究模式。

本文於 2022 年 2 月 12 日收稿；2022 年 4 月 26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黃文信

³⁰ [清]張聖誥等纂修，[康熙]《登封縣志》（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 6，〈職官〉，頁 5a；[清]廖騰燧修，汪晉徵等纂，[康熙]《休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2，〈壇祀〉，頁 292。

³¹ 皆收錄於石雲里，《海外珍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集成》（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0）一書。